

穆斯林朝觐与“信仰伊斯兰” 的维系与扩张*

• 钮 松

[内容提要] 一个单纯以伊斯兰信仰为凝结的全球穆斯林共同体——“信仰伊斯兰”，因朝觐的存在而得到维系与发展，即便受到世界战争、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朝觐者的步伐从未完全中断。通过年度性朝觐，以实体化的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无形的“信仰伊斯兰”共同体，则最大限度与那些伊斯兰教的过度政治化、被暴恐势力“搭便车”以及社会固化的歧视或连坐符号相脱钩，有利于伊斯兰教的正本清源。自1924年沙特王室攻占麦加以来，采取了诸多措施来保障朝觐的有序展开，这对于切实维系并扩张“信仰伊斯兰”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统一圣地、保障安全、改造交通、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13CZJ017）、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参与中东热点问题中的大国协调研究”（16JJDGJW012）的资助。

空间网络。如何弥补长期排队却无法获得朝觐机会的穆斯林的缺憾与愤怒,如何提升穆斯林幼童对朝觐的直观认知,甚至如何正面影响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看法,“虚拟朝觐”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信仰伊斯兰”正被全球穆斯林通过有形的陆海空朝觐交通网和无形的互联网所连通,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张。

[关键词] 朝觐 信仰伊斯兰 政治伊斯兰 圣战
伊斯兰 虚拟朝觐

当今时代,穆斯林朝觐无论从朝觐者的数量,还是从朝觐者来自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都有了明显的改观,其所具有的广泛代表性已经改变了朝觐原本的阿拉伯色彩,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穆斯林共襄盛举的年度性宗教盛会。朝觐规模与代表性的大幅提升与伊斯兰教的全球传播息息相关,这期间既有阿拉伯帝国的征伐主动向外传播,也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基于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无意间传播,也有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贸易自由化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人员跨国流动,伊斯兰教的全球化^①经历了战争—殖民—移民的传播历程,其手段日趋和平。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其主要的行为体便是穆斯林个体,这与伊斯兰教诞生的时代和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社会形态有着巨大关联,其终极理想是建立穆斯林的共同体“乌玛”。而在“乌玛”建成之前,如何通过一种非政权或非军事的途径来维系穆斯林之间的认同对于伊斯兰教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先知穆罕默德通过继承与改造前伊斯兰教时代以麦加为中心的

^① 参见[美]罗伯特·比安奇著、忻华译:《伊斯兰全球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

多神朝圣仪式，并以自身所属的古莱氏家族控制的克尔白为核心，躬身垂范了伊斯兰教的朝觐仪式。不仅如此，真主还通过降示穆罕默德的话语，在《古兰经》中明文规定了朝觐作为穆斯林的宗教功课而存在，即伊斯兰年历每年12月的若干日子，无论信徒身居何处，在身体与经济状况许可的前提下，都必须在一生之中至少前往麦加朝觐一次。伊斯兰教从麦加诞生向外持续传播的过程，与全球穆斯林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每年从各地跋山涉水汇聚于麦加的过程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一个单纯以伊斯兰信仰为凝结的全球穆斯林共同体——“信仰伊斯兰”，便因朝觐的存在而得到维系与发展，即便受到世界战争、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朝觐者的步伐从未完全中断。

一、穆斯林朝觐与“信仰伊斯兰”面临的三种挑战

随着20世纪60年代现代国际关系中“宗教回归”步伐的加快，尤其是在作为标志性时间节点的1979年，伊斯兰教的全球复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在2001年的“9·11”事件上得到总爆发。不仅如此，伊斯兰教及其信徒穆斯林无论在国际关系之中，还是在国内政治之中，都存在着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篡改和滥用，或者被非伊斯兰国家和民众误解和恶意敌视，这些都造成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污名化问题。而全球穆斯林因单纯的宗教信仰而得以通过年度性朝觐，以实体化的形态所展现出来的无形的“信仰伊斯兰”共同体，则最大限度与那些伊斯兰教的过度政治化、被暴恐势力“搭便车”以及社会固化的歧视或连坐符号相脱钩，有利于伊斯兰教的正本清源。穆斯

林朝覲实际上对三组关系进行了拷问，这也有助于一个纯粹的“信仰伊斯兰”引起关注。

（一）伊斯兰版本的信仰之争：“政治伊斯兰”与“信仰伊斯兰”

“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与伊朗伊斯兰革命有着极大的关联。尽管学术界和伊斯兰宗教界对于什么是“政治伊斯兰”的问题莫衷一是，但其最核心的要素便是将伊斯兰教中的政治思想异化为信仰，即事实上以意识形态化的伊斯兰教政治思想作为信仰，来取代伊斯兰教信仰本身。这种异化造成的后果是，在广大穆斯林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了伊斯兰教高度政治化、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错觉。这些思想混乱与认知错觉，既有“文明冲突论”喧嚣下西方国家的有意为之，但更是伊斯兰教内有关宗教人物和团体的大肆鼓动，这两股迥异思潮的合谋共同制造出了伊斯兰教即政治的刻板印象。

首先，伊斯兰教的主流派是逊尼派，作为非主流派的什叶派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展的伊斯兰革命并不能代表全世界什叶派的政治思想，更无法代表广大逊尼派的政治思想。伊朗在1978年针对巴列维国王的街头抗议并非是霍梅尼领导，许多普通的伊朗民众乃至伊朗什叶派宗教层只是反对国王的“白色革命”，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过度西化与世俗化表示忧虑，并未主张建立一个霍梅尼倡导的“法基赫监护”下的伊斯兰共和国。原属反对阵营的伊朗末代首相巴赫蒂亚尔在国王流亡海外之后，批准霍梅尼回国的举措，也只是为了政治和解而采取的妥协，他坚决反对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而是建议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到什叶派圣城库姆建立一个梵蒂冈式的城国。霍梅尼单方面授意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组织临时革命政府，巴赫

蒂亚尔被迫流亡海外。即便如此，由于霍梅尼利用绑架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人质危机支持激进反美势力，临时政府却对此表示不满并请辞，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于1979年11月1日与巴扎尔甘见面表达和解意愿，于是伊朗强硬派指责巴扎尔甘背叛了革命，霍梅尼也不断发话：“我们的年轻人必须挫败这些阴谋。”^①这说明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和激进反美政策一开始便遭遇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激烈反对。正是由于霍梅尼的激进伊斯兰革命输出政策，导致其以“反美反以”为主线，并同时反对海湾君主国家及其支持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恶化了自身与超级大国的关系，更是恶化了周边的安全环境，尤其是八年的两伊战争导致了霍梅尼的“雅各宾”时期在1988年停火后结束，正如伊朗问题专家阿里·吉斯里（Ali Gheissari）和瓦里·纳赛尔（Vali Nasr）所言，“伊斯兰共和国的雅各宾阶段在1988年开始走向瓦解，这出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从公开场合消失以及伊朗在与伊拉克作战中表现出了筋疲力尽之后”，“随着战争的最终结束，伊朗的革命进入了‘热月’时期。”^②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以后，伊朗的激进内外政策才有了较大改观。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伊朗与沙特之间围绕朝觐展开斗争，伊朗基于自身的“政治伊斯兰”理念将朝觐高度政治化，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剧烈冲突。伊朗朝觐者在麦加举行游行示威并呼喊反美反以的口号，这与朝觐本身的非政治化实质相违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也是极为少见的。

^① Michael Rubin, "Why Rogue Regimes Take Hostages," *CNN*, April 24, 2015.

^② Ali Gheissari, Vali Nasr, "Iran's Democracy Debat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1, Summer 2004. “雅各宾”时期和“热月”时期是法国大革命中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期，分别代表着法国大革命疾风骤雨的激进时期和巩固革命成果的政局相对稳定和改革时期，作者用“雅各宾”和“热月”形象地比喻了1988年前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直到近年，伊朗仍在朝觐问题上与沙特冲突不断。

其次，在逊尼派大国之中，并未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政权，无论是世俗共和国还是海湾君主国，总统和国王的世俗权力实际上高于教权，对于后者的权限也有着严格的限制。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大旗的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世俗化程度较高，伊斯兰教基本上退回到私人信仰领域，对于如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的挑战，埃及等国予以坚决打压，极力维护世俗共和体制。埃及总统穆尔西在“阿拉伯之春”中受穆兄会支持选举上台，他采取了向“政治伊斯兰”转向的政策，这引发了埃及世俗化守护者军方的高度警惕并最终通过政变接管政权。对于此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高度赞赏称，“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意味着‘政治伊斯兰’的终结。”^①大力支持推翻叙利亚政权的沙特也对埃及军方表示支持。以沙特为代表的保守君主国，虽然其王权属于实权君主制，但王国建立在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谢赫家族联盟联姻的基础之上，更为关键的是，国王已兼任沙特瓦哈比教长，并在1986年将国王的“陛下”称谓改为“两圣寺监护者”，这就暗含着沙特国王以世俗君主身份守护伊斯兰圣地的同时，又以瓦哈比派领袖的身份掌握最高教权。沙特王权与教权分设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沙特体制是政教联盟而非政教合一，瓦哈比派高级乌里玛在关键时刻都会为王权服务，如1979年麦加禁寺事件中允许在禁寺动武、海湾战争后允许美军进驻沙特等事件上发布“法特瓦”，为王室和政府提供宗教合法性。1979年麦加禁寺事件中，逊尼派“政治伊斯兰”势力便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指责沙特王室和瓦哈比派乌里玛背叛伊斯兰

^① 《叙总统称埃及总统下台证明“政治伊斯兰”终结》，2013年7月4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7-04/5004447.shtml>（登录时间：2017年7月20日）。

教成为了异教徒，声言要将麦加从异教徒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宣称逊尼派极少涉及的“马赫迪”已经复临，沙特政权对于各种“政治伊斯兰”予以高度关注。

因此，从伊斯兰信仰的视角来看，真正的信仰只能是伊斯兰教信仰本身，而不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伊斯兰政治思想。伊斯兰教本身就已要求在朝觐期间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伊斯兰朝觐对“政治伊斯兰”进行了否定。

（二）将暴恐势力与伊斯兰脱钩：“圣战伊斯兰”与“信仰伊斯兰”

1967年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利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彻底占领，标志着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衰落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随着宗教全球复兴的加剧，尤其是什叶派主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逊尼派发动的麦加禁寺事件，使得武力与暴力的使用愈发频繁，许多以伊斯兰为旗号或指导思想的组织和个人愈使用“吉哈德”或“圣战”的话语，展开其对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净化和抗争。阿富汗的抗苏战争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演变为一场全球“圣战士”与无神论苏联或东正教之间的战役。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沙特富商本·拉登大力资助各国圣战士，苏联撤军阿富汗的前一年，“基地”组织最终成立。就苏联而言，入侵阿富汗被视为苏联解体的开始，对于苏联国内的东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东正教与伊斯兰教逊尼派是苏联最大的两个信仰群体，他们已共处700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国际伊斯兰组织在资助与武装阿富汗反对派方面扮演的角色是重大的。苏联在阿富汗的重大人员伤亡与实际上的失败，已经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描绘

出了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第一个负面形象。”^① 苏联解体以后，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开始兴起并最终与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合流。

此后二十余年，“基地”组织将矛头逐渐对准西方大国，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开始进驻沙特，“基地”组织展开了针对美国的“圣战”。就阿富汗而言，苏军撤离以后的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一支以宗教学校学生为主体的武装组织“塔利班”最终于1994年进入首都并统治了该国绝大部分国土，“基地”组织在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得到庇护。“9·11”后，塔利班政权因拒不交出本·拉登而被美国武力推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大批圣战分子和团体自阿富汗移师伊拉克，使伊拉克成为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新的大本营。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后，叙利亚陷入内战状态，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地区成为了“伊斯兰国”的大本营。“伊斯兰国”原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后被“基地”组织开除并与其分庭抗礼。“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展开竞争，其恐怖外溢效应已严重影响到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②

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将伊斯兰教脱离当今时代背景进行解读，试图在当下复制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并对“吉哈德”的概念进行了割裂，无限放大了其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武力的限制。不仅如此，“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区以武力滥杀妇

^① Alexander Sotnichenko, "Islam-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elations and the State in the Post-Communist Russia," *Politics and Religion*, vol. 3, no. 2, 2009, p. 270.

^② Song Niu, Bing Fan, "An Overview of the Middle East Immigrants in the EU: Origin, Status Quo and Challenges," *İstanbul Gelişim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3, issue 2, October 2016.

女、儿童，强迫其他宗教信仰徒改宗，整肃着装，更为荒诞的是，还进行性奴交易，并出版手册予以指导。该手册由 CNN 于 2014 年 11 月首先报道，12 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东媒体研究所”（MEMRI）翻译并发布，“这本小册子本身似乎在给出指令，即妇女和女孩怎样可被出售、她们怎样可被用来当作小妾，以及她们怎样可作为馈赠的礼物。”^① 该手册还引用《古兰经》经文来为性奴进行合法性包装。英国反恐智库奎利姆基金会（Quilliam Foundation）的哈拉斯·拉菲克（Haras Rafiq）指出：“这是一个病态与恶心的文件，并且它将世界带回到黑暗时代（Dark Ages）。现代世界里没有奴隶制的空间。有关于 IS 战士强奸女俘的广泛报道，如今这已成为反 IS 宣传的一部分。该文件应该是规范这些战士行为的一种方式。”^②

过分凸显武力的“吉哈德”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本意，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针对非穆斯林和妇孺的暴行也绝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本意。事实上，伊斯兰教明确规定，麦加是和平之城，在朝觐期间严禁朝觐者携带武器，并积极鼓励女性前往麦加朝觐，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女性朝觐者的数量大幅上升，在土耳其和印尼等国已超过男性朝觐者。穆斯林朝觐实际上对“圣战伊斯兰”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三）将歧视、连坐与伊斯兰脱钩：“拉面帮”“切糕党”与“信仰伊斯兰”

尽管从身份来看，广大穆斯林分属不同部族、种族、民族、国家或地区；从职业上来看，广大穆斯林几乎分布在社会各行

^① Jessica Elgot, “Islamic State ‘Slave’ Manual Permits Sex with Pre-Pubescent Girls, and Gives Details on Beating ‘Slaves’,” *Huffington Post*, December 14, 2014.

^② Ibid.

各业（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产业领域除外），但伊斯兰教创立的本身便是为了超越血缘与肤色，伊斯兰教也鼓励广大信徒从事各种职业。因此，作为信仰的伊斯兰实际上与世俗的身份或职业符号并不兼容，但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教往往会与特定的身份或职业捆绑，从而这些世俗符号绑架了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这种情况在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都是存在的事实，在非伊斯兰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

以中国为例，穆斯林身份便被政府与十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捆绑，即回族、维吾尔族等十个少数民族的民众被默认为全民信教，但事实上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之间并不完全重合。一方面，许多世代散居在非穆斯林聚居区的这十个少数民族居民事实上已经淡化或者放弃了伊斯兰信仰，而这些民族中入党的民众也被默认为放弃了原有信仰而与党的无神论世界观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事实上存在着这十个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众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如“汉族穆斯林”^①等。中国铁建修建沙特朝觐高铁期间，便有多批中国工人在麦加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如果说民族与伊斯兰教身份的挂钩引起的争议相对较小的话，那么将特定职业或行为与多数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特定民族群体挂钩，更容易造成对其过度聚焦而产生误解。随着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的加快，以及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特产，“兰州拉面”“维吾尔切糕”“新疆羊肉串”等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了回族、撒拉族、维吾尔族等特定民族在其他民族眼中的独特符号，2016年3月的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参加青海省代表团审议时便提到了“拉面经济”，并询问了青海拉面的由来及其

^① 参见宋启元：《汉族穆斯林群体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与兰州拉面的区别等情况。^①事实上,经营“兰州拉面”的主要是“青海穆斯林经商户”,“青拉”与“兰拉”之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的一些行为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青海省伊斯兰教协会甚至发布了《致在省外经商穆斯林的倡议书》,明确指出:“曾几何时,我们业内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诸如私立行规、妨碍公平竞争,有的地方遇有事情要挟政府、漫天要价等,影响了当地社会稳定。”“我们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市场规律,还要遵守伊斯兰教的商业道德,坚决反对欺行霸市、垄断市场和不正当竞争。”^②此外,全国各地许多以卖切糕为名的少数民族商贩以欺诈和强买强卖为主,已经激发了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并造成了许多群体性事件,如2012年的岳阳“16万切糕事件”影响极其恶劣。有新疆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强买强卖在全国各地的车站、港口、旅游区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岳阳的‘切糕事件’就性质来讲并没有很特殊的地方,之所以引发潮水般的围观和吐槽,是警方处理此事的结果和涉事人员的地域族群背景。”^③于是乎,极其负面的“拉面帮”与“切糕党”等称谓经由特定民族最终与伊斯兰信仰挂钩,甚至成为了作为信仰的伊斯兰教的代名词。

从伊斯兰教的信仰来看,“拉面帮”与“切糕党”的作为都不符合伊斯兰教所规定的商业道德,两者非但不能等同于作为信仰的伊斯兰教,更无法取而代之,但其在社会生活中对于伊斯兰的污名化比“政治伊斯兰”和“圣战伊斯兰”更为隐

^① 倪光辉:《总书记问“青海拉面”,关心贫困地区劳务输出》,2016年3月10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10/c1024-28189354.html>。

^② 青海省伊斯兰教协会:《青海省伊斯兰教协会致在省外经商穆斯林的倡议书》,2016年1月3日,<http://www.chinaislam.net.cn/cms/news/local/201602/19-9883.html>。

^③ 吐尔文江·吐尔逊:《哪个民族切糕都不值16万》,载《环球时报》,2012年12月5日。

蔽。穆斯林朝觐鼓励全天下的穆斯林在《古兰经》所规定的时间齐聚麦加，共同完成基本的宗教仪式。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沙特对于符合要求的朝觐者除国籍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都未加限制（如肤色、职业、教派等），基于国别的朝觐配额和接待制度也只是为了提升效率。穆斯林朝觐本身就鼓励商业行为，全球朝觐者和朝觐组织者都是朝觐经济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他们坚决反对违背“信仰伊斯兰”的商业欺诈和恶性竞争。

二、从圣地到信徒：朝觐对“信仰伊斯兰”体系的维系与扩张

刻板的“政治伊斯兰”“圣战伊斯兰”与“拉面帮”“切糕党”等面孔都无关真正的作为信仰的伊斯兰教及信徒。麦加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第一大圣城，尤其是克尔白是全球穆斯林礼拜的方向，全球穆斯林从各自所在地前往麦加朝觐的陆路、海路和空路路线图，绘织成了伊斯兰朝觐所维系的“信仰伊斯兰”体系的外在浮现。回顾历史，圣地的主事者为了促进朝觐的顺利开展付出了不同的努力，但收效各异。自1924年沙特王室攻占麦加以来，采取了诸多措施来保障朝觐的有序展开，这对于切实维系并扩张“信仰伊斯兰”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统一圣地、保障安全、改造交通、空间网络。

首先，统一圣地。朝觐仪式涉及麦加城内的克尔白、阿拉法特、穆兹达里法、米纳等地，朝觐者一般从麦地那的戒关出发前往麦加，在完成朝觐仪式后还会返回麦地那的先知寺进行拜访。许多海路抵达的朝觐者往往在吉达港登陆。因此，完成

朝觐实际上离不开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等城市之间的合作，如若阿拉伯半岛处于分裂状态，尤其是半岛西部地区的群雄并立，就会对朝觐功课的完成带来巨大的阻碍。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开创伊斯兰朝觐的实践，实际上反映了他对阿拉伯半岛政治分裂、社会堕落、信仰混乱局面的抗争。在阿拉伯半岛上，公认阿丹创建了克尔白，但是易卜拉欣在大洪水以后予以重建。此后阿拉伯半岛陷入长期的崇拜偶像的“蒙昧时代”(*jāhiliyya*)，麦加及其周边的宗教圣址被不同的部落相继控制，有些地方的权力转移到古莱氏部族手中。前伊斯兰教时代的朝圣活动由此分为两种：第一种被称为 Hajj，时间在都尔黑哲月，宗教活动的地址主要在米纳和阿拉法特；第二种被称为 ‘Umra，时间在拉嘉伯月，宗教活动的地址主要在克尔白、萨法与麦尔卧两山，此种朝圣活动被古莱氏部族所控制。古莱氏部族由于对 Hajj 的朝圣活动缺乏控制，因此禁止在 Hajj 时节前往阿拉法特参加此类朝圣，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以牺牲没有控制的米纳和阿拉法特的神圣性来提升拥有完全控制的麦加克尔白的神圣性。这些朝圣指向多神，安拉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克尔白则尤其与胡巴尔神 (Hubal) 有关。^①先知穆罕默德在促进麦加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糅合了这两种多神的朝圣，将不被其控制的 Hajj 朝圣予以改造，继承了 Hajj 的名称并将其改造为伊斯兰朝觐中的正朝，时间仍为都尔黑哲月，但宗教仪式的地点涵盖了古莱氏部族所控制的地区，并以克尔白为中心；古莱氏过去所掌控的 ‘Umra 朝圣则被改造为伊斯兰朝觐中的副朝，时间扩展为全年，宗教仪式地点与正朝保持一致，副朝并非具

^① Harry Munt, “Pilgrimages in Pre-Islamic Arabia and Late Antiquity,” in Eric Tagliacozzo and Shawkat M. Toorawa, eds., *The Hajj: Pilgrimage in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6 – 18.

有强制性且无法取代正朝的地位。先知以伊斯兰教为旗号统一了两种类型的朝圣并最后统一了圣城，这对“信仰伊斯兰”的维系及日后的扩张具有开拓性意义。

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哈里发试图加强对圣城的实际掌控，但伊斯坦布尔与麦加之间的地理距离限制了其权力的拓展。奥斯曼帝国任命的麦加大谢里夫以及阿拉伯半岛上其他部族抵制苏丹延伸其权威的努力，连同半岛上的帝国臣子和半独立部族对帝国修建朝觐铁路阳奉阴违，暗中破坏。一战爆发，尤其是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以后，阿拉伯半岛上出现了两支劲敌：控制圣城的希贾兹王国与冉冉兴起的纳季德苏丹国，双方对麦加和麦地那的争夺对朝觐造成了负面影响，尤其是1924—1925年间，麦加、麦地那与吉达分属敌对政权。直到1925年底沙特王室攻下吉达以后，侯赛因父子彻底失去了对圣地的控制，伊本·沙特兼任希贾兹国王，直到1932年一个统一的沙特王国最终出现。圣城统一在沙特王室的旗帜下已有90年，正是在沙特王国的领导下，朝觐人数从最初的每年数万人增至如今的二三百万人。即便遭遇了“大萧条”、二战以及数次中东战争的负面影响，沙特在朝觐管理上仍不遗余力，朝觐成为了沙特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

其次，保障安全。安全往返于所在地与圣地之间是对朝觐得以维系的最基本保障。从世界整体安全的角度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朝觐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二战对于东南亚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更是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从中东地区安全的角度而言，中东战火频发也影响了陷入战乱的中东国家穆斯林的朝觐。不仅如此，“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中东乱局产生了大量难民，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难民长途跋涉、背井离乡，远离伊斯兰的“心脏”前往欧洲国家，其生命安全和经济状况

使其无法考虑朝觐问题。沙特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为促进国际与地区和平做出了不懈努力，就改善朝觐安全而言，其主要关注点在于确保朝觐者在圣城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从历史上来看，朝觐者在前往圣城途中遭遇劫匪是一个普遍现象，而这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生态有着极大关联。阿拉伯半岛是贝都因人的发源地，由于阿拉伯半岛内陆的沙漠地貌与干旱气候及由此带来的生活贫瘠，迫使贝都因人以劫掠为生，伍麦叶王朝诗人顾托密曾形象地指出了这种特性：“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①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贝都因劫掠者对朝觐者和圣城都构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这种冲突是全球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冲突中的一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在历史长河中是两个长期平行的世界，一般而言，“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农耕世界偏南，在偏南的地方，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②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有三次较大的冲击，其中第二次冲击就包括了阿拉伯人，“公元七世纪，还有从亚洲西南角冲入农耕世界的属于闪族的游牧部落，这就是同样精于骑兵作战的阿拉伯人”，“自从马被引进阿拉伯的草原地区，阿拉伯就组成一种特别的马和骆驼相配合的骑兵。马用以奔驰作战，骆驼用以载运辎重。”^③ 历代王权均十分重视朝觐的顺利开展，对于促进朝觐安全更是不遗余力，但直到伊本·沙特攻占麦加以后，朝觐安全问题才得到明显改观。伊本·沙特“坚决主张

① [美]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50页。

③ 同上，第53页。

确保朝觐道路的安全，袭击那些劫掠朝觐者的部族”，1926年朝觐时节，伊本·沙特“邀请了希贾兹的部族首领们并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对朝觐者安全的责任划分，警告他们，如若有朝觐者遭到任何伤害，那么整个部族必须对其进行赔偿。”^①除此之外，伊本·沙特还通过建立“伊赫万”将贝都因游牧民改造为定居民，这也促进了贝都因部族的转型。总而言之，在沙特王国的统治下，朝觐者的安全得到较好的保障，但近年随着外国朝觐者数量的剧增，许多外来穆斯林滞留沙特，对朝觐者构成了新的安全威胁。尽管“在今天的中东，各国都喜欢叫自己的小毛贼为‘阿里巴巴’”，“最恶劣的阿里巴巴是骗你上了车后，不是开往麦加大清真寺，而是载你去荒郊，把你扔在沙漠，身上财物行李全被抢夺，有的女性朝圣者更惨遭强暴”，但“沙特官方一般认为这些阿里巴巴都是流入的朝圣者，因为沙特本土罪案有限，而且通常都是严刑以待。”^②沙特确实已经极大地确保了朝觐和朝觐者的安全。随着20世纪下半叶宗教的全球复兴以及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针对圣地的恐怖袭击也时有发生，但这是非传统安全之威胁，加上沙特的有力打击和伊斯兰教的教义，这些恐怖袭击对于圣地的影响相对较小。

再次，改造交通。自建国以来，加强沙特国内交通现代化的发展一直是沙特王室和政府的目标，在朝觐领域尤为如此。除了通过政治高压和建立“伊赫万”来约束贝都因人以外，沙特还通过经济手段来减少游牧民对朝觐通道的阻扰。传统上各国朝觐者主要通过陆路进入圣城，海路抵达阿拉伯半岛的朝觐者到港以后也是如此，而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沙特统

① Saud al-Sarhan, "The Saudi as Managers of the Hajj," in Eric Tagliacozzo and Shawkat M. Toorawa, eds., *The Hajj: Pilgrimage in Islam*, p. 209.

② 叶中娴：《窥视中东》，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95页。

治圣地之前，长期以来存在着三条从麦地那到麦加的路线：一是叙利亚旅队；二是拉西德家族的“山区旅队”；三是希贾兹贝都因部落的“飞行旅队”，也被认为是最安全和最好的选择，而朝觐者需要向贝都因人缴纳所谓的“兄弟税”（*khawah*）。^① 沙特王国统一圣地，消灭了政治对手，基本降伏了贝都因游牧民，开始积极引入现代交通工具，这既能提高运送朝觐者的效率，又能更进一步促进贝都因从游牧业向定居农业的转型。20世纪20年代末，伊本·沙特用卡车运送朝觐者，坚决打击“伊赫万”极端保守宗教思潮对现代器物的排斥，从此为沙特王国合法改造朝觐交通打开了大门。1930年，沙特荷兰银行在福特汽车对沙特出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② 此后，吉达、麦地那、麦加之间的朝觐汽车运输开始发展起来。直到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沙特石油产业的蓬勃发展，沙特的公路建设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1951年，当第一条柏油马路在首都利雅得铺建完工时，全城居民欢呼雀跃。今天，沙特阿拉伯全境几乎每个乡村都有柏油马路。”^③ 奥斯曼帝国曾策划的希贾兹铁路的麦地那至麦加段近百年来只存在于图纸上，但由于朝觐者数量锐增，传统的朝觐公路交通相对落后且造成的空气污染严重，沙特政府开始筹划圣城之间的铁路建设以提升运送朝觐者的效率，最终中国铁建获得了承建权。目前，中国承建的朝觐高铁正在修建中。在此之前，麦加朝觐轻轨项目也由中国铁建修建竣工，并于2010年朝觐期间投入使用，极大促进了朝觐者在圣城之间流动

① F. E. Peters, *The Hajj: The Muslim Pilgrimage to Mecca and the Holy Pla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94 - 296.

② Saudi Hollandi Bank, "SHB Overview," <http://www.shb.com.sa/en/about/Ab> (登录时间: 2017年7月20日)。

③ 刘少才:《沙特阿拉伯的公路交通》,载《交通与运输》,2015年第3期,第30页。

的效率。

就国际朝觐交通而言，随着全球航空业的发展，沙特阿拉伯积极参与发展航空业，其首选目标便与朝觐有关。二战即将结束时，伊本·沙特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就战后国际秩序等进行了交流，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赠送了一架道格拉斯DC-3飞机给伊本·沙特，标志着沙特航空业的起源。这架飞机在吉达、利雅得与达兰之间运送人员与邮件。1945年底，沙特向美国购买了4架DC-3飞机，在此基础上，1946年9月，沙特航空公司正式成立。1946年10月，沙特航空首趟国际航班飞往耶路撒冷，返程途经贝鲁特并最终回到麦加，其任务就是运送朝觐者。^①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全球许多国家已经实现了与吉达、麦地那的直航。二战结束时，超过80%的朝觐者通过海路抵达沙特，10%通过陆路，仅有7%通过空路。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有大约50%的朝觐者通过空路前往沙特，30%通过陆路、20%通过海路。如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航空公司垄断朝觐旅行，许多国家甚至希望禁止通过陆路与海路前往沙特。^②可见，全球朝觐者前往麦加的效率因航空业与沙特国内的高铁、轻轨建设的发展而大大提升，吉达与麦地那的国际机场在近年也不断得到扩建以便容纳更多的国际旅客。鉴于沙特极少开放旅游市场，因此大部分接待能力主要面向各国朝觐者。

最后，空间网络。随着国际空间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越来越受到此类高新技术的影响。整体来看，当前朝觐者的平均年龄呈下降趋势，文化程度不断提升，换言之，

^① “Saudi Arabian Airlines History,” http://www.the-saudi.net/dia/saudi_arabi_an_airlines_history.htm (登录时间: 2017年7月20日)。

^② Robert R. Bianchi, “The Hajj by Air,” in Eric Tagliacozzo and Shawkat M. Toorawa, eds., *The Hajj: Pilgrimage in Islam*, pp. 132-133.

朝觐队伍中拥有娴熟网络技术的穆斯林正在不断壮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世界宗教开始利用网络开展宗教活动,“网络宗教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便大大提高了宗教团体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事实上,网络的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①朝觐作为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宗教活动,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具有天然动力。“随着‘数字原住民’一代通过运用网络进行教育和抚育成人,其不断增长的网络素养和网络接入已对穆斯林个人和社群造成了深刻影响。”^②朝觐已与 Facebook、YouTube、Twitter、Google Earth 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手机地图向导运用 GPS 技术为朝觐者提供帮助,此外,手机 AMIR 朝觐 app 和 3D 克尔白等也为朝觐者准确完成各项朝觐仪式提供指导。“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还通过“伊斯兰在线”网站(Islam Online)发布过其制作的“虚拟朝觐”,“虚拟化身(avatar)将以朝觐者的装束出现。这意味着任何人,无论来自何种宗教背景(或无),都可在线开启这段旅程。”^③事实上,朝觐期间麦加一些特定区域对使用电子设备是有严格限制的,因此许多朝觐者“谨慎地将手机置于戒衣之内”^④,这也说明沙特能从正面看待网络技术

① 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系列专著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页。

② Gary R. Bunt, “Decoding the Hajj in Cyberspace,” in Eric Tagliacozzo and Shawkat M. Toorawa, eds., *The Hajj: Pilgrimage in Islam*, p. 231.

③ Ibid., p. 235.

④ Ibid., p. 233.

与朝觐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沙特官方也主动寻求空间与互联网技术对朝觐具体流程上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沙特与中国华为公司合作促进朝觐期间通讯的畅通。华为公司1999年开始进军沙特，到2007年12月，已成为朝觐通讯服务最大的合作供应商，在“交换机设备供应、基站建设和网络服务等各方面均已击败爱立信、诺基亚等国际竞争对手，占据了朝觐通讯服务领域最大的市场份额。”^①此后，华为公司在朝觐通讯服务保障上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与沙特第二大运营商 Mobily 一道为朝觐通讯保驾护航。“在 Hajj 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同时进行业务呼叫、短消息服务或位置更新。在这一特定时间段，话务冲击将严重破坏网络负荷均衡”，“在 Mobily 与华为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实现了 Hajj 的通信保障。数百万穆斯林朝圣者，在他们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时刻，可以顺畅地与他们的亲友分享这份神圣的喜悦！与此同时，稳定运行的通信网络，有效支持沙特王国政府连续四年实现了‘平安朝觐年’的目标。”^②习近平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访问的第一个国家便是沙特，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利雅得报》发表的文章中专门提及：“中国公司开发朝觐通信保障方案，连续多年确保了朝觐期间通信畅通。”^③1月19日，在中沙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沙正式签署《中沙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沙建发新闻中心卫星导航领域正式合作机制，

^① 李震：《华为成沙特朝觐通讯服务最大合作供应商》，载《国际金融报》，2007年12月18日。

^② 林广伟、覃世永：《为了朝圣者的喜悦：华为多厂商管理服务助力 Mobily 实现高性能网络》，载《华为服务》，2010年第2期，第23—24页。

^③ 习近平：《做共同发展的好伙伴》，2016年1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18/c_1117812832.htm（登录时间：2017年7月20日）。

为加快推进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① 基于华为公司在朝觐通讯上的良好业绩，中国北斗卫星未来在朝觐问题上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沙特还大力推进朝觐签证的电子化发展，自2015年开始启用电子通道系统（External Haj E-Services Portal）以来，其核心目标便是将朝觐签证申请与朝觐者在沙特期间的食宿、交通等方面的安排挂钩，实行“打包”服务^②，这对于沙特过去的朝觐管理方式是革命性的。2016年朝觐开始，沙特首次给朝觐者提供了GPS定位手环，里面有详细的个人信息，其目标在于既便于查询个人情况、及时提供帮助，又能以科技手段进一步限制非法朝觐者。^③

三、从信徒到圣地：“虚拟朝觐”与 “信仰伊斯兰”体系的维系与扩张

沙特通过多种途径来确保朝觐者在圣地的安全与朝觐仪式完成的连贯性，不断扩大全球朝觐者的接待数量及其来源的广泛性，这些确实较好维系了“信仰伊斯兰”的体系，并使其处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由于近年为了进一步扩大接待朝觐者的能力，沙特对麦加禁寺的庞大扩建工程和大量酒店的修建，使

① 《中沙签署卫星导航谅解备忘录》，2016年1月20日，<http://www.beidou.gov.cn/2016/01/20/2016012032bedd26086c402e84e1365028ffa732.html>。

② 参见 Ministry of Haj, “External Haj E-Services Portal: Haj Company NOT under Haj Mission Representative Guide,” <https://ehaj.haj.gov.sa/docs/ehaj/pdf/userguide/en/HajCompanyNOTunderHajMissionRepresentativeGuide1.0.pdf>, 以及 Ministry of Haj, “External Haj E-Services Portal: Housing Provider Representative Guide,” <https://ehaj.haj.gov.sa/docs/ehaj/pdf/userguide/en/HousingProviderRepresentativeGuide1.0.pdf>。

③ 王波：《2016年穆斯林麦加朝觐正式开始》，新华社，2016年9月10日。

得麦加城处于一种“大兴土木”的状态，这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沙特的朝觐接待能力。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沙特单方面宣布削减年度朝觐名额，这对一些伊斯兰人口大国造成了巨大压力，对前往麦加朝觐的渴望是诸多穆斯林，尤其是年长穆斯林的心声。许多有能力朝觐的穆斯林，由于受所在国朝觐配额的限制和其他原因，长期无法获得朝觐机会。除了年长穆斯林以外，全球穆斯林还从幼童着手来加强其信仰，如何生动形象传递伊斯兰知识给穆斯林幼童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操作性的问题。对于如何弥补一些穆斯林长期排队但无法获得朝觐机会的缺憾与愤怒、如何提升穆斯林幼童对朝觐的直观认知，以及如何正面影响非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看法等问题，“虚拟朝觐”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虚拟朝觐”从信徒及其所在地为出发点，目标直指麦加，尽管这无法取代真正的朝觐，但也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宣示，其目标仍然是为了获得真正朝觐的机会以及熟知朝觐的仪式。

（一）抗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虚拟朝觐”

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人口大国，在促进本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方面也不遗余力。土耳其在凯末尔革命后走上了以“西化”为特征的激进世俗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去伊斯兰化”，凯末尔坚持的是宗教与国家分离，即伊斯兰教退回到私人信仰的领域，且在公共空间内更多保持在衣饰上的非宗教特征，这与法国式的政教分离和宗教政策有相似之处。二战结束以后，土耳其开始走上政治民主化道路，除了政坛的争斗以外，宗教复兴也成为了土耳其国内的一股新思潮，构成了全球宗教复兴浪潮的组成部分。土耳其国内的斗争逐渐演变为恪守凯末尔政治遗产、坚决捍卫世俗化的军方与各种伊斯兰背景政党之间的博

弈，甚至在认为选举上台执政的伊斯兰政党有背离国家世俗化方向之嫌时，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将其赶下政坛，甚至将其解散。即便如此，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中还是培育出了一支稳固的中产阶级队伍，“省城里虔诚的中产阶级的组织能力和选举权力已经得到稳步增强。朝觐的增长和稳定性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也是中产阶级的成功所带来的副产品。”^① 由于朝觐配额的存在，土耳其普通朝觐抽签近年也开始为年迈的申请人让路，这实际上激化了其国内在朝觐问题上的矛盾，“2013年沙特几乎惹恼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朝觐董事会，因为沙特临时减少了20%的朝觐配额，而且大多数遭到驱逐的朝觐者已经上缴了当年朝觐之旅所需要的费用。”^② 在此背景下，作为抗议沙特朝觐管理的和彰显土耳其穆斯林对麦加朝觐的渴望，伊斯坦布尔于2013年7月开展了一场“虚拟朝觐”活动。

2013年7月18日，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滨的奥斯曼清真寺附近的广场上，为本已获得朝觐资格但因沙特单方面削减朝觐名额而无法前往麦加的土耳其穆斯林举行了一场“虚拟朝觐”。广场中央放置着天房的模型，广场四周竖立了三个巨大的屏幕，播放着麦加的图景，一位真正的朝觐向导带领着七名演员进行引导，本次“虚拟朝觐”由成百上千的“突然”失去朝觐资格的准朝觐者参加。作为活动举办地伊斯坦布尔市埃于普区（Eyüp）的区长，伊斯迈尔·卡文库（İsmail Kavuncu）称，“据我们所知，这是世界上的首次虚拟副朝觐”，“所有我们企盼的，是对那些没有路子朝觐，或从访问伊斯兰圣

① [美] 罗伯特·比安奇著，王佳尼译、钮松校：《当代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朝觐与政治》，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一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城名单上被划掉的我们的人民有些许宽慰。”2013年，有大约1.48万名土耳其准朝觐者失去了朝觐机会，“尽管这种虚拟程序并不能履行宗教义务，但它至少为那些无法开启沙特阿拉伯之旅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安慰”，一名47岁的家庭主妇苏海拉·耶尔德雷姆（Suheyra Yildirim）说：“我们已在名单上4年了，而且现在已使事情变得更糟了，因为名额已被减少。尽管这与亲身在那里并不一样，但这也是如此美丽。”^①

土耳其的“虚拟朝觐”并非该国在对抗沙特朝觐管理方面的主要工具，其主要途径仍集中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即在G20、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伊斯兰金融等国际组织和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协同其他伊斯兰人口大国，共同应对沙特，以图通过获得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来换取沙特在朝觐管理方面的妥协。相对于这些较为硬性的抗争方式，“虚拟朝觐”尽管作用有限，但其视觉冲击力明显，与政治性的抗争和宗教性的对抗都有所不同，它模拟的是非政治化的朝觐本身，因而“虚拟朝觐”的过程中并未有对沙特的直接批判，而是在行为上单纯模拟部分朝觐仪式。

（二）培土：各国幼童教育中的“虚拟朝觐”

对于伊斯兰信仰群体而言，信仰的传承离不开对幼童的培养。各国穆斯林根据所在国的国情对穆斯林幼童的宗教教育大加重视。在伊斯兰国家，主要通过幼儿园和学校教学中提供一定的宗教课程，尤其对于学龄前儿童，家庭与社会通过多元途径共同促进其伊斯兰知识的增进。伊斯兰朝觐不仅是“五功”

^① “Turkey Find Solace in Virtual Pilgrimage as Saudi Cuts Haj Quotas,” *Reuters*, July 18, 2013.

之中最为神圣的功课，其在麦加开展的诸多仪式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视觉冲击力，因此朝觐教育对于各国穆斯林幼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除了有关朝觐的童话书、绘本、模型制作、观看视频等手段外，最直观的体验便是进行朝觐模拟活动。按照英国伦敦卡姆鲁兹·泽曼（Qamruz Zaman）大毛拉的观点，“生理上成熟（Baligh）是使朝觐成为义务的一项条件。就男性而言，从青春期的迹象出现开始，如梦遗、长胡须等。如果没有迹象的话，从第15个阴历年开始。就女性而言，从月经开始，或者如果没有月经的话从第15个阴历年开始”，“假如一个幼童开展了朝觐，那么他/她的朝觐是有效的，并且他/她将会因此得到奖励，若主意欲。然而，此类朝觐并不被视作义务性的朝觐”，“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在成年以后再次开展义务性的朝觐（Hajj e Fardh）。”^① 换言之，儿童可以去朝觐，其朝觐有效却非义务，其成年以后仍需开展一次义务性的朝觐。

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朝觐名额日趋紧张，以及对朝觐者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的要求，再加上幼童成年之后需再度朝觐，因此绝大多数朝觐者为成年穆斯林，幼童实际参与朝觐的人数极少。为了增强幼童对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朝觐功课的认知，幼儿角色扮演式“虚拟朝觐”应运而生。男童往往身着戒衣参与“虚拟朝觐”，其核心仪式便是围绕天房的模型开展逆向巡游七圈的“塔瓦夫”，并以天房为坐标，了解其他朝觐地点的方位。在约旦、印尼、巴勒斯坦等伊斯兰国家相对较多地见诸报道。印尼尤为注重对未成年人的“虚拟朝觐”教育，针对初中生的朝觐模拟也不时开展。2013年在加沙地带，当地小学便组织了“虚拟朝觐”，其内容涉及天房巡游、剃发、献祭等朝觐仪

^① Qamruz Zaman, “Hajj for Childs,” December 4, 2007, <http://www.muftisays.com/qa/question/1889/hajj-for-childs.html> (登录时间: 2017年7月20日)。

式。幼童角色扮演式“虚拟朝觐”在诸多伊斯兰国家往往被作为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其效果也较为明显。

与单日连续模拟朝觐部分仪式所不同的，还有一种以“朝觐周”为主题的多日朝觐模拟。马纳拉特（Manarat）利雅得学校国际部幼儿园便是如此。该校成立于1979年，最初为沙特国王大学西方国家雇员子女提供中等英语教育。该校主要采用英美教材和考试机制。目前该校拥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3500余名学生，拥有超过100名的教职工。大部分学生是利雅得各大学、医院、使馆和商业机构中埃及和巴基斯坦员工的子女，也有许多是沙特幼童。该校幼儿园每年开展“朝觐周”活动，一间特殊的房屋被用来描绘所有朝觐步骤与仪式的微缩版，幼童在教师的指引下完成朝觐的步骤和仪式，“朝觐周”的每天清晨集合时，幼童都会如同真正的朝觐者那样念诵“遵命词”（Talbiya）：“我来了，安拉啊！我遵命来了……”^①由于国际学校通行的是西方教育且学生不全是穆斯林，因此“朝觐周”对于强化穆斯林幼童的宗教认同，以及增进非穆斯林幼童对于伊斯兰教的认知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三）普适：“麦加3D”数字化“虚拟朝觐”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虔诚的穆斯林以能到麦加朝觐为荣。但前往麦加朝觐对健康与经济都有要求，即便符合这些要求，获得朝觐机会亦非容易之事。随着伊斯兰教在国际关系中被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针对年度性庞大规模伊斯兰朝觐的过度政治化或安全化在许多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受

^① Manarat Al Riyadh International Sections, “Academic Activities,” <https://manaratryadhen.maarif.com.sa/Details.aspx?id=21>（登录时间：2017年7月20日）。

伊斯兰教规定所限，非穆斯林无法前往麦加一探究竟。尽管当前已有许多朝觐相关的电视节目，但这只能是“管中窥豹”式的被动体验，并无法让人切身掌握朝觐的全貌，甚至还会因宣传之嫌而对此类节目保持距离。角色扮演式“虚拟朝觐”往往只针对幼童。“麦加3D”的出现为那些无法前往麦加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以及即将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提供了一次主动式、身临其境体验朝觐的机会。

事实上，在“麦加3D”出现之前，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尤素福·盖尔达维主办的“伊斯兰在线”（IOL）便资助了朝觐模拟项目，朝觐模拟在2007年12月推出，旨在为穆斯林参加朝觐和对朝觐仪式与步骤好奇的非穆斯林提供指导。这也是“伊斯兰在线”通过“第二人生”（SL）^①推出的唯一且最大规模与设计的项目。朝觐模拟重现了麦加城内与朝觐有关的部分，依照顺序标以数字，一旦触碰这些数字按钮便会得到具体朝觐场景的信息，其语种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在进行体验时，“并未有会在现实生活中的朝觐者抵达麦加伊始使其惊吓到的世俗的入侵，未有处理垃圾的需求，也没有处理朝觐协定所需要的数百万公羊献祭”，于是就“存在着两个麦加的模糊，第一个被与其在阿拉伯半岛之位置的自然地理所绑定，并且第二人生的空间被视为神圣的，尽管看起来仅被视作教育的工具，但它被用户用来见证为对圣城的情感体验所。”^②

“麦加3D”是由知名软件与游戏开发团队 Brainseed Factory

① 全球最大的3D虚拟世界，其官网是 <http://secondlife.com/>（登录时间：2017年7月20日）。

② Krystina Derrickson, "Second Life and the Sacred: Islamic Space in a Virtual World," *Digital Islam*, 2008.

开发的“虚拟朝觐”APP，该APP创始人是彼拉·什比卜（Bilal Chbib）。“麦加3D”的目标是：“让你自己沉浸在一个迷人的伊斯兰3D世界里。潜入一个知识的虚拟世界之中，体验真实敬拜的基本原理。”该APP涵盖了一些已经开发、或打算在不远的将来投入运行的功能，主要包括：（1）“朝觐与副朝觐指导”，主要用来引导朝觐仪式、祈祷话语、帮助理解朝觐的意义与回报；（2）“时间机器”，主要用来观摩先知及其同伴的朝觐，甚至回溯到易卜拉辛的时代；（3）“真正的知识”，主要用来从令人振奋的真实互动、伊斯兰所珍视的娱乐方式以及重大事件（如象战、哈达格之战）中获得教育；（4）“虚拟现实技术支持”（VRT），主要用来通过指尖的操控，配以所佩戴的虚拟现实耳机，天房就会如同在眼前一般；（5）“互动世界”，主要用来与其他角色互动，成为令人沉醉的虚拟环境的一部分，并通过按钮来了解为何礼拜与如何礼拜。“麦加3D”可在iPad、iPhone和安卓系统运行。^①

结 论

穆斯林朝觐通过具体仪式完美地阐释了伊斯兰教所蕴含的“和平”与“顺从”的核心价值观。朝觐的特质，促使国际社会透过主动或被动附加在伊斯兰教身上的高度政治化、暴力化和庸俗化的标签，来观察和思考作为纯粹信仰的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年度性的契机，隐藏在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标签下的“信仰伊斯兰”因朝觐而得到最佳地物理性呈现。沙特作为东道

^① 参见“麦加3D”官网：<http://mecca3d.net>（登录时间：2017年7月20日）。

主，为全世界朝觐者前往圣城麦加保驾护航，提供便利；全世界穆斯林中的一部分通过年度性朝觐奔赴麦加，而其他穆斯林则通过多种“虚拟朝觐”的方式来维持与麦加之间的情感联系。事实上，“信仰伊斯兰”正被全球穆斯林通过有形的陆海空朝觐交通网和无形的互联网所联通，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张。当前伊斯兰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作为伊斯兰基本制度存在的朝觐积极塑造和展示了“信仰伊斯兰”，对伊斯兰教在国际关系中的正面形象产生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著（译）者简介

肯尼斯·沃尔德 (Kenneth Wald)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杰出教授

阿利森·卡尔洪—布朗 (Allison Calhoun-Brown)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阿兰·鲍尔 (Alain Bauer)

法国国立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犯罪学教授、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
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格扎维埃·罗费尔 (Xavier Raufer)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犯罪学教授、上海高校
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
心客座教授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
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
研究中心研究员

章志萍

海军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副教授、上海高
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中心研究员